引 言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令其南满铁路守备队，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地段的一段铁轨，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同时栽赃中国驻军，并以此为借口，令其第二师团的 3 个联队协同南满铁路守备队，突然向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袭击。与此同时，派出重兵围攻沈阳城。从此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推行其扩张主义“国策”，以及蒋介石集团实行媚外、独裁、内战三位一体政策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它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实施其扩张计划的罪恶开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图谋，由来已久。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解决其发展资本主义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矛盾，把向外扩张特别是向中国大陆扩张，定为“基本国策”。早在 1868 年，明治天皇执政伊始，就发表御笔信，公然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 为此，以“强兵富国”为号召，实行军国主义。逐步实施其吞并朝鲜，灭亡中国，征服世界的‘既定国策’。19 世纪末叶先后占领我国台湾，吞并琉球群岛，出兵朝鲜，直至发动甲午战争。野蛮地迫使清廷割地赔款，强占辽东半岛，为尔后吞并满洲和入侵中国内地建立起战略基地。

①《明治文化全集》第 2 卷，第 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膨胀。于是决定进一步推行其“大陆政策”。1927 年 4 月 20 日，长洲军阀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他为加速入侵“满蒙”步伐，于同年 6 月 27 日，在东京召集“东方会议”，商讨对华政策。会议经过 11 天的密谋筹划，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确定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会后，田中将其确定的侵略方针密奏裕仁天皇。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① 此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即以“奏折”为“脚本”。“九·一八”事变，即为“奏折”丑剧的序幕。

当日本军国主义密锣紧鼓、行将入侵东北之际，国民党当局虽有察觉，但仍继续集中兵力于南方“剿共”，置北国安危于不顾。毋庸讳言，国民党内也不乏爱国之士，但他们无法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蒋介石，虽然民族意识未完全泯灭，但在他的民族意识和阶级利益的天平上，其重心总是在阶级私利一边。当他维护领土主权的主观愿望与其阶级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宁可牺牲前者而维护后者。他曾说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可以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这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偏执的恐共与仇共心迹。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一再制造事端，不断挑衅。如 7 月间，接连制造杀死杀伤为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中国农民 269 人的万宝山事件；以中国边防军处死潜入防区的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为借口而煽起反华狂潮的中村事件等。东北爱国军民忍

①《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6 册，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第 339 页。

无可忍，曾奋起抗争。对此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仅不支持，而且一再密令制止。1931 年 7 月 12 日，蒋介石电示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翌日又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名义电张：“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① 8 月 16 日，蒋介石再次密电张学良（“铣电”），明确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② “不抵抗主义”盖源于此。蒋介石如此三令五申，仍不放心，复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周（9 月 12 日）亲赴石家庄，秘密召见张学良，面谕：“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③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再次奉蒋介石和南京当局命令，转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沈阳守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谓：“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缴械任其缴械，入营任其入营。”④“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⑤ 这样，日本关东军更加肆无忌惮，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 3 天时间，就占领了辽宁省除辽西一隅之外的所有重要城镇。前后 4 个多月，东北三省国土全部沦入敌手。

南京当局感到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难以向国人交待，于是用开门揖盗的自欺欺人的言行来敷衍民众和安慰自己。采取所谓“以公理对强权”“以交涉对武力”的“对策”，寄希望于

①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 1973年版，第 85 页。

②《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24 页。

③《文献与研究》第 3 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 1986 年版，第 56 页。

④《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国民党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抵抗运动》，第 3 页。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11 页。

国联调处。其主要应变举措就是向国联喊冤告状，乞求国际联盟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撤兵。同时幻想西方帝国主义从维护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殖民主义利益出发，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制止侵略扩张。这些在逻辑上似乎说得过去的想法，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枕黄粱美梦。

“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正义舆论齐声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而少数法西斯和极端反共反苏分子，则为日本侵略者撑腰打气，赞赏有加。至于各国政府，主要是美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态度十分微妙，但基本上都是采取所谓不介入的“中立主义”。实际上是怂恿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仇苏反共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心态复杂，亦喜亦忧。喜者，日本军国主义加紧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满洲，筑起进攻苏联的桥头堡，以一支匕首抵住苏联的脊背，给苏联造成很大的牵制和威胁。这对反苏反共分子可谓是喜出望外。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决不以侵占东北威胁苏联为满足，其战略目标是独占中国，称霸东亚以至整个亚太地区，这无疑是给西方帝国的东方殖民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和威胁。这是西方帝国尤其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美国在中国拥有相当的利益。1930 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达 36428.6 万海关两，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6.5%。[①]同时美国正染指东北，试图取得东北的铁路建筑权和贸易特权。其在东北的投资，居东北地区外国资本的第三位。所以，日本要独霸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对美国无疑是个重大打击。至于太平洋地区，美国列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个地区，美日矛盾由来已久。日本的“海洋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美国。随着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展开，美日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因此，美国

①《国闻周报》第 8 卷，第 50 期：《最近列强与中国之经济关系》。

对日本的每一步扩张行动都给予极大关注。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美国一方面期望引起日苏冲突，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一方面又希望日本扩张有所限制，不要过多地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持消极观望态度，除表示“惊讶”、“遗憾”,希望中日两国和平解决争端外,别无所为。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扩张行动无止境的扩大，态度才有所转变。美国政府开始由“惊讶”转为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对日本政府发出警告。但也仅此而已，并无实际行动。

英法政府的态度，比美国政府更为消极。英法同苏联同处欧洲，对社会主义苏联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与仇恨，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们极力怂恿日本军国主义矛头北指，并希冀假日本之手镇压中国日益高涨的反帝运动。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同样严重损害着英法的在华利益。英国是老牌帝国，其在华的殖民利益在西方帝国中首屈一指。法国在中国也拥有相当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殖民地越南又与中国毗连，唇齿相依。日本势力在华的扩张以至独霸中国，对英法在华和东南亚的利益将是个致命的威胁。这是英法政府所不希望和不能容忍的。他们希望日本势力的扩张受到制约，但又无力东顾，生怕弄不好反而得罪日本。因此不愿也不敢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于是转而求诸国际联盟。希望通过国联对日本的扩张势力加以制约。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 1919 年巴黎和会通过的《国联盟约》,于 1920 年 1 月成立的国际组织。先后加入国联的有英、法、中、日、德等 60 多个国家。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长期为英法两国所把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就中日争端问题多次开会商讨，并三次作出决议。第一次决议不分青红皂白，对中日双方提出“紧急警告”，要求“双方撤兵”。本来中国军队驻在自己国土上，对日军的进攻又采取“不抵抗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退避三舍，该把兵撤向何处？这明显地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不容国联置喙，断然排除第三者干涉”的强硬态度，而偏袒侵略者。第二、第三次决议，虽然在肯定所谓日本“无领土野心”的前提下，限期日本撤兵，但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断然拒绝接受。而且变本加厉，把侵略扩张迅速推向东北全境。国联束手无策，其决议形同废纸。

后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和日本并吞东三省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国联得到日本同意后，于 1932 年初成立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李顿一行带着殖民主义的偏见到中国来调查。在中国人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以及要求国联主持正义的强烈呼声下，李顿的调查报告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维护主权的要求，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作了一些揭露。但“报告书”的整个基调却是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同时袒护日本的侵略罪行。更有甚者，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换取日本进攻苏联。“报告书”还荒谬地主张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这就撕掉国联调查团所谓“公正”的面纱，暴露了西方帝国主义欲与日本侵略者一起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国联在研究了李顿的报告书以后，于 1933 年 2 月 24 日，作出相应的决议案和通过报告书。由于报告书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并否认东北（溥仪）傀儡政权，日本代表投票反对并退出会场。随后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我行我素。国联与西方帝国徒叹奈何。

西方帝国所以显得如此软弱，主要是因为当时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无暇东顾。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存在恐战情绪，“和平主义”对西方各国政府以很大的约束，同时西方大国各怀鬼胎，未形成一致对付日本的统一战线，谁都怕单独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只好采取绥靖主义政策，明哲保身。

国联和西方帝国的软弱与胆怯表现，不仅使国民党寄希望于

国联的幻想彻底破灭，而且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受到鼓舞。起初，日本对美国和国联的警告还有所顾忌，随后把西方帝国的底牌摸透了，就肆无忌惮地放开手脚大干。由辽沈而扩张到整个东三省，又由东三省入侵中国内地，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不示弱，他们在世界正义与和平力量声援下奋起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工农民众立即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第三天，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侵占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9月22日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国主义运动。号召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复于9月30日，再次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三省的野心以及国民党当局的“无抵抗主义”、“逆来顺受”和所谓“镇静外交”的屈辱政策，唤起民众提高警觉，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祸国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东北爱国军民纷纷拿起武器，自发抗战，组织一支又一支抗日义勇军。为了发展东北人民抗日形势，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地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参与领导抗日义勇军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抗日运动的发展。抗日义勇军队伍虽然武器简陋，军事素质低下，难以与敌抗衡，但他们不畏强暴和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成为尔后坚持持久抗战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军事上也给侵略者以相当的打击。

与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相呼应，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在各地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富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群众，一马当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

下，上海 3.5 万码头工人于 1931 年 9 月 24 日举行反日罢工。上海 23 家日本纺织厂的工人积极酝酿反日同盟罢工。 10 万学生举行罢课和反日示威游行。 28 日，北平 20 万人举行抗日救国集会，要求南京当局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学生冒雨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敦请当局立即改变“逆来顺受”的屈辱外交政策，为国家伸张正义。由于当局态度恶劣，无视民众要求，激起请愿学生义愤，当场捣毁了外交部办公机关，并砸伤了忠实执行蒋介石所谓“镇静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而蒋介石比王正廷狡猾。他恪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对群众的激愤进言，实施缓兵之计，故免遭皮肉之苦。11 月 26 日，蒋在南京接见上海中等学校学生请愿团时，面对要求立即出兵抗日的愤怒学子，立即表示：“决心北上”，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捍卫国家主权。翌日又被迫接见上海各大学请愿学生。在情绪激昂的学生诘问下，蒋介石为摆脱窘境，竟信口开河指天发誓：“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之头以谢天下”。历史证明，蒋介石是言而无信的。就在他“发誓”后的第四天，就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在 11 月 30 日对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训词中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决心全力“剿共”和排除异己。至于“收复失地”之说，早已置之脑后。

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国民党进退维谷。当他们虚与委蛇，以图化解群众抗日怒潮而遭致失败时，恼羞成怒，转而采取镇压手段。1931 年 12 月 17 日，汇集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全国各地学生会同南京学生共 3 万多人举行抗日救亡联合大示威。当游行队伍行经珍珠桥时，国民党军警突然发动袭击，当场打死学生 30 多人，伤 100 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七”（珍珠桥）惨案。

南京当局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许多正直的社会活动家和专心治学或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

抗日民主洪流。他们或上书国民党最高当局，或集会结社，伸张正义。并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的一支新的民族民主革命大军——新兴的中国民主党派。

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正义斗争，得到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正义舆论的同情和支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和人民一再表示对中国的同情，极力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警告日本，如果日军向中东路继续进兵，苏联不能取旁观态度。① 10月19日，苏联政府再次发出声明，表示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苏联报刊舆论更是旗帜鲜明地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及其霸权野心。10月29日，《真理报》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11月5日，该报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②

苏联各界劳动人民曾多次举行集会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苏联政府除在道义上的支持外，在一些实际问题上还采取了有利于中国的行动。如当日军北犯长春等地时，苏联政府向日本驻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和警告，迫使日军一度停止沿中东路北进的行动。1932年冬，当一部分抗日义勇军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严词拒绝了日方“引渡”义勇军将领的要求。毋庸讳言，苏也曾多次声明，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和“中立主义”态度。这是苏联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中国人民是可以理解的。

除苏联外，一些中小国家特别是饱经帝国主义凌辱的小国、弱国以及大国中的人民对中国也深表同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①《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第9页。
②《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22页。

行径表示愤慨。瑞士的《日内瓦报》，针对日本的狡辩，于 9 月 21 日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日本的行动，明明是武力侵略行为，违反了华府条约、非战公约及联盟会章”。西方各大国的人民和正直舆论也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谴责日本侵略者。美国《纽约世界电闻》9 月 21 日指出：“日本乘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公约，连保证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① 《纽约晚报》 9 月 22 日尖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② 美国群众还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以道义上的支持。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进步舆论如《人道报》等，对日本帝国主义背信弃义，践踏国际公约的暴行作了有力的抨击。当国联在巴黎召开讨论“九·一八”事变会议时，法国总工会、教职员联合会、社会党保障人权会、共和党战士协会、农工联合会、促进国际联盟运动委员会、妇女选举运动会等法国政党和群众团体在巴黎召开大会，一致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按照国联公约惩罚日本。会后，各群众团体代表结队到日本驻法国大使馆示威，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③

日本人民也同世界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日本后，东京、大阪、横滨等大城市以及富山、青森、立石、山田等地的工人，不顾反动政府的镇压，先后举行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反对满蒙战争”、“（日军）退出中国满洲”等口号。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处于无权和被统治地位，他们的要求和主张一时还难以左右其政府的政策，无法遏止日本帝国主义

①《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第 17 页。
② 同上，第 18 页。
③见《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17 期，附录第 5 页。

的侵略行动。但他们强大的正义呼声，却可唤起尚未觉醒的人们加入反帝反侵略的行列。这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起着鼓舞和支持的作用，功不可没。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谋求民族解放的斗争，自然离不开国际援助。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于是，觉醒的炎黄子孙纷纷组织起来，中国的民主党派应运而生。新的民族民主力量登上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舞台，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战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爱国民主人士组织起来，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屈辱退让，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中间党派、社团为祖国命运担忧。为敦促国民党开放民主和抗敌御侮，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纷纷组织起来，参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图促使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已建立起来的党派、社团也开始转变政治态度，把抗日救亡列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形成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

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最大的绊脚石。要抗日必先排除障碍。因此，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祸国殃民政策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就成了中国人民两项不可分割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首举抗日反蒋义旗，这是历史使然。同武装力量有联系的中间党派除率先实行武装抗日外，也追随中共之后，举起“反蒋抗日”旗帜。手无寸铁的民主党派、社团，则运用自己的知识武器和社会声望，奔走呼号，发动民众，向南京当局施加压力，迫其出兵抗日。

1935 年的华北事变，把中华民族命运推向绝境边缘，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博大的胸怀，捐弃前嫌，再一次向全国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同全国工农兵群众一起，掀起民主运动新高潮。国民党当局为形势所迫，开始表示将放弃不抵

抗政策，准备抗战。中共根据国民党态度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基本政策和策略，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中间党派与中共协调一致，也放弃了反蒋策略，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国内和平及国共合作得以基本实现，既是中共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胜利，也是民主党派和全国民众抗日民主运动的伟大成果。

第一节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首举义旗

（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东北，首受其害者是东北民众。国破家亡，迫使众多的东北人民流离失所，逃亡关内。留在家乡者，更是难忍亡国之辱。他们起初遵从南京政府指示：“听候中央处置”。结果候来的是不抵抗政策和亡家之恨。他们失望了，再不能指望南京政府“收复失地”，只能依靠自己救自己。于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组织起来，拚死抗争。

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领袖们如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阎宝航、辽宁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辽宁省商会会长金哲忱等挺身而出，在东北同胞支持下，于 9 月 27 日在北平宣告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北救国会”）。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 31 人被推选为东北救国会执行委员，阎、高、卢和车向忱、杜重远、王化一等 9 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军事、政治三个部。各部部长、副部长由常务委员兼任。总务部部长卢广绩，副部长高崇民；军事部部长王化一，副部长彭镇国、熊飞；政治部部长阎宝航，副部长杜重远。此外，还设立各科专门委员会，以开展具体工作。

东北救国会是爱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团体。其宗旨是“抵抗日人入侵，共谋恢复失地，保卫主权”。其基本任务是开展

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和组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其中又以抗日宣传和武装抗日为中心。

组织武装抗日　　东北救国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抗日救亡活动。首当其冲的是积极动员和组织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抗日。东北救国会由北平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出关，到东北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东北民众积极响应，揭竿而起，组织起一支又一支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与此同时，东北救国会还派人同东北军的一些爱国将领联系，动员他们与民众义勇军协同抗日。

东北军中不乏爱国将士。“九·一八”事变后仍留在东北的一些爱国将领，如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吉林边防军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吉林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步兵第二旅旅长兼中东路哈满线护路军司令苏炳文、步兵第三旅旅长兼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等① 激于民族义愤，在东北民众爱国热情鼓舞下，先后拒绝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命令，奋起抗战。此外，还有相当数量带宗教色彩的大刀会一类的群众组织，以及一些尚有爱国心的“绿林好汉”，在东北救国会的感召下，也毅然弃旧图新，加入抗日义勇军行列。

中共满洲省委因势利导，不仅充分发挥东北抗日救国会内共产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而且派遣周保中、李延禄等一批得力干部，参与领导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进一步推进了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抗日义勇军在斗争中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迄 1932 年春“伪满洲国”成立前后，东三省各地抗日武装共有 250 多支，约 15 万人。其中在辽宁境内由东北抗日救国会直接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就有 120 多支。到同年夏，仅辽宁境内的民众抗日义勇军就发展到 30 万人，遍布辽宁、辽热边的广大乡村。他们

①马占山在黑龙江陷落后，曾一度降日，旋即反正，坚持抗日。

到处袭击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军事据点，使日伪军不得安宁。

吉林、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的主力，是由原东北军爱国官兵组成的，特别是这些队伍中有中共满洲省委派去的杨靖宇、李兆麟、周保中、赵尚志、李延禄等富于指挥才干的共产党员参与领导，所以比一般民众抗日武装更具有战斗力。如著名的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镜泊湖伏击战、攻打吉林及长春之战、（嫩）江桥抗战等战役战斗，都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开展抗日宣传　开展抗日宣传，这是东北救国会的又一项中心任务。东北救国会确定以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为重点，先后派出王化一、徐清远等人到平津各大学，阎宝航等到上海，开展宣传活动。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确凿事实，控诉日本侵略者侵占和掠夺东北的暴行，倾诉东北人民遭受凌辱的苦难，报告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英勇斗争的情况。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抗日救亡，当务之急是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以大力支援。

为了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唤起全国民众一起投入救亡运动，东北救国会还创办了《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等抗日救国刊物，以纸笔为武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的罪行及独霸中国的野心；声讨汉奸认贼作父，策划“东北独立”运动的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对外屈服，对内用兵，以及置东北 3000 万同胞于日寇铁蹄之下而不顾的祸国殃民政策；报道东北抗日义勇军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使人们读后激起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仇恨，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慨，给予东北同胞以无限同情和力所能及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抗争，又反过来给内地同胞以极大的鼓舞，有力地推动内地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东北抗日救国会还同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救国团体如“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法学院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救国会”“民国学院东

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协同行动。或上书国民党当局，敦促其出兵东北抗日，并要求制裁汉奸卖国贼；或鼓励热血青年到北平张学良处请缨抗日；或组织街头宣传队，走向市井，以演讲或文艺形式宣传群众，使抗日救亡的呼声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救国宣传活动。

（二）联合行动，南下请愿

为敦促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东北抗日救国会于 1931 年 10 月 28 日决定，联合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学生和在平的东北各民众抗日团体，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南下上海、南京请愿。时值国民党分裂对峙的两派——宁（蒋介石为首）粤（汪精卫为首）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议”会议。请愿团计划先到上海向国民党宁粤两派和谈会议请愿，然后转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目的在于促成宁粤两派两个“国民政府”统一起来，团结御侮，出兵抗日，收复失地。

11 月 5 日，以冯庸为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的请愿团 600 余人，齐集北平火车站，准备乘车南下。但铁路当局却按照国民党北平当局的指令，拒不挂车。受制于蒋介石的张学良也奉命劝阻。悲愤交集的请愿群众被迫拚死抗争，纷纷卧轨，阻止行将南去的一列客车运行。同时声泪俱下地向车上旅客倾诉东北同胞的悲惨遭遇，呼吁国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齐心救国。来自各方的乘客身份不一，但都深受感动，主动让出这趟列车给请愿团乘坐。有的乘客还表示愿意一道前往南京请愿。结果这趟列车变成了请愿团的专列，在一片欢呼声和道谢声中，徐徐开出北平车站，载着东北同胞的迫切要求和国人的期望，向目的地飞驰而去。

请愿团经过两天的旅途劳顿，于 11 月 7 日抵达上海,受到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陈立廷为总干事的上海青年总会以及上海商会等社团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恰好国

民党宁粤两派和议会议于请愿团到达上海的当天结束，宁方代表已离沪回宁。请愿团只好临时决定推选高崇民、卢广绩、阎宝航等代表请愿团去会见仍逗留上海的粤派领袖胡汉民、汪精卫，陈述东北同胞的希望与要求。其他人则由王化一率领，在上海举行游行示威。当时上海大雨滂沱，然请愿团浑然不顾，个个情绪激昂，顶风冒雨，阔步行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惩办汉奸”的口号声，响彻十里洋场，赢得了上海民众的敬佩与深切同情。目击者为游行队伍鼓掌助威，以示支持。这次不同凡响的游行，在上海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11月10日，请愿团折转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请愿。蒋介石得知信息后东躲西藏，不肯直面请愿团。11日晨，请愿团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会见蒋介石。吴铁城、张继代表蒋介石出来劝大家早日北返，并说不要受别人“煽动”等等。代表团当场驳斥了他们所谓受人“煽动”的离间之说，并表示非要蒋介石出面不可。后来得知蒋介石躲进中央军校，避见请愿团，请愿群众异常愤慨，于是，大队人马又冒着瓢泼大雨，忍着饥饿，直奔中央军校。蒋介石仍想逃避。请愿群众铁了心，表示不接见决不离开。蒋介石无奈，一直拖到下午3点多钟，才出来会见请愿群众。这时，天津学生请愿团正好赶到，一起参加会见。高崇民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后，慷慨陈词，请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① 这番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诘责，把蒋介石质问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十分尴尬。稍后恼羞成怒，竟把气撒在天津学生请愿团上。他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

①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9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